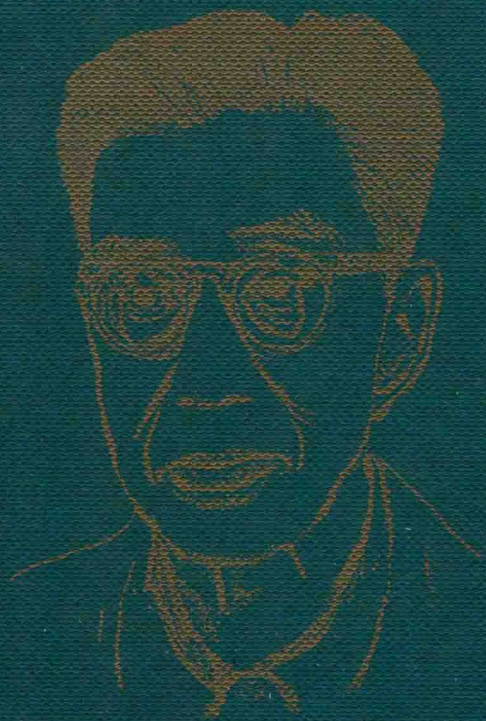


Collected Works of He Tianxing

何天行文集

何天行 / 著 周 膺 何宝康 / 编校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何天行文集

何天行 / 著 周 膺 何宝康 / 编校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天行文集 / 何天行著; 周膺, 何宝康编校.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8-12735-6

I. ①何… II. ①何… ②周… ③何…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0215号

何天行文集

何天行 / 著 周膺 何宝康 / 编校

责任编辑 葛玉丹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开本 889mm×1094mm 1/16

印张 23.25

字数 680千

版印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308-12735-6

定价 18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何天行



何天行与顾锦元结婚留影（1942年）



何天行之子（左起：五子何庆祥、二子何家胜、四子何宝康、长子何大展、三子何左雄）



雁聲海外飄飄去 雁影
圈中黯澹存何事 主
人歸未得萬蘆花 鎖
一柴明 戊寅秋杭州何益

本考の緣起

《杭縣良渚鎮的石器与黑陶》是我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把我收集的实地資料，以经过調查作一番整理与選擇后，印成爲圖錄，並綴有說明，作簡明介紹，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在上海吳越史地研究会出版的一本考^{屬於}是吳越史地研究会所出版的叢考之一。

吳越史地研究会，最初由山西人考古家衛聚賢先生所提倡，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在上海創立的，是完全以研究吳越地方的古代历史与考古爲宗旨的學術界的一个研究会，會址設於上海金神父路花園坊內。衛聚賢先生任總幹事。有理事^人，都上海南京^諸大學教授及考古學者。由蔡元培先生任名譽會長，作爲吳越史地研究會的創導人。並舉辦各地所發見的古物的展覽。在擬定的出版物中，我的這本考，是吳越史地研究会叢考的第一種。

一九二五年，李濟先生在山西省發掘西陰村的史前遺存時，衛聚賢先生已注意到考古的調查。他對於西北的彩陶，是研探有素的。他在自己的家鄉山西省萬泉縣荆村還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彩陶。

(20×30=400)

序 言

浙江大学教授、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何天行

何天行先生，字摩什，幼名无双，1913年10月10日（农历癸丑九月十一日）酉时生于杭州福缘巷世医之家。父名公旦，号颂华，是江南名医。医道之外，诗、书、画均有造诣。母吴氏，为人醇厚。先生自幼勤奋好学，十七岁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预科，后又入上海中国公学。1935年中国公学停办，经教育部大学甄别考试，以中国文学系第一名录取，转学到复旦大学四年级。1936年毕业。此后曾任上海沪江大学国文讲师、云和联立中学教员、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书馆主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古器物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干部、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等职。1957年后因病在家休养，直至逝世。

先生学识渊博，于文学、历史、考古、社会、经济等学科均有研究。一生著书七八部，论文三十余篇，为我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35年先生在上海求学之时，得悉杭州古荡一带有石器、陶器出土，但未受重视，以致器物流散民间。先生认识到这些器物十分重要，就利用假期到古荡及良渚、长命桥一带进行调查研究，由此发现了良渚遗址，同时还发现了比甲骨文更早的黑陶文字。这一发现得到了考古界前辈董作宾、卫聚贤等先生的重视。1937年4月上海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了先生所著《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这是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的第一种，是最早介绍良渚遗址的考古学著作。它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蔡元培先生亲自题写书名，卫聚贤先生写了《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一文附于书末。先生在此书《绪言》中说：“浙江在春秋战国以前，绝少历史上真确的史料，文化不彰，向以为文身断发的蛮荒境界，现在发现了这样优秀的文化遗迹，可见浙江的远古文化本极悠久，将吴越文化的源流拉长了几千年，不独藉此补充文献上所欠缺的材料，且从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而论，这次的发现，亦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径。”先生的这一论点是在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刚起步时提出的，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先生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除良渚文化遗址外，50年代初先生还在浙江上虞、余姚、绍兴、慈溪等地发现多处遗址。1955年先生在萧山城西近湘湖山麓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后经9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发掘，成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即跨湖桥遗址。

除史前文化的研究之外，先生对中国古代龟卜文化亦有独到之见。早在1940年先生在上海《学术》第一辑上发表《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一文，根据《诗经》的材料推测周人与殷人一样迷信占卜，并认为陕西地下埋有卜甲。这一推测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50年代，先生的论断才得到实物的证明。到70年代陕西周原遗址发现了大量占卜甲骨，更证实了先生1940年所作推论的正确。有人统计，到目前为止，西周甲骨文的发现地（包括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共9处，合计312片，字数1033字。在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面前，人们不能不钦佩当年何天行先生卓越的科学论断。

先生对夏代史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初已着手。曾先后发表《论民族起源与文化孕育》、《东北与西南》、《夏代诸帝考》、《禹即九州考》、《桀放南巢考》、《夏代方位之蠡测》、《中国之形成》、《夏地理考》。1957年后撰写的《夏殷之际种族文化考》、《说夏篇》、《夏代史研究》等手稿，于1966年“文革”时被全部抄走，片纸无存。实在令人惋惜。

先生对《楚辞》的研究与考证，始于30年代初在中国公学就读文学系时。1933年暑假，先生在上海沪泰东书局购得《清代朴学大师评传》、《楚辞研究》、《尚书去伪》、《朱谦之古学扈

言》、《古微书》等书，读后引伸斟解，颇有所得，于是对《楚辞》传说作了考证，并寄一信给中国公学董事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评语：“中公学生何天行，好学深思。”对先生的研究给予热诚的勉励。1938年，先生写就《楚辞新考》一文发表在吴越史地研会主办的《楚辞研究》。1948年又将此文修改补充，更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由中华书局出版。1976年后，先生又先后写成《楚辞的产生》、《〈战国策〉无屈原事迹与考古发现资料试探》、《〈离骚〉中的句语名词试解》、《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考证它的作期和时代》、《汉淮南王与〈离骚〉的流传》、《屈原传说记疑与〈史记·屈原列传〉的考证》等文。他对《楚辞》产生年代的研究独辟蹊径，不囿于成说，从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地名学等多角度进行审视和考证，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楚辞》这一古代名著起了有益的作用。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成绩斐然，但为人十分谦逊。十年前《文物天地》曾刊登吴汝祚先生《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何天行》一文，提及卫聚贤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年来中国》一书中谈到何天行先生在良渚发现了黑陶，而何先生则说：“此事应归功于在采访中告诉我出土陶器的乡民农人。”这一故事令人十分感动。何先生不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是我应该学习的榜样。

周膺、何宝康两位同志要我为《良渚文化与中国早期文化研究：何天行学术文集》作序，使我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以前未曾见过的先生的文章，由此增长了许多知识，真是获益匪浅。在此特向周膺和何宝康两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2007年11月11日

何天行先生的行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石兴邦

《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是何天行先生于65年前写的关于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的论著，也是介绍良渚文化最早的文献，在良渚文化的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已绝版，罕为人知，故于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5周年之际，本文集特重新予以发表，以怀念前贤，而励来者。

何天行先生（1913—1986）是老一辈考古学者中一位有贡献的人，他祖籍杭州，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1936年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相继任职于杭州、上海文教单位，曾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杭州艺专图书馆主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古器物学兼职教授，并在上海市文化局任职，处理文物等事宜。解放后，曾在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任研究员，后因健康原因，离职居家休养。

先生博学广识，举凡文学、历史、考古、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都有涉猎，并深有造诣。发表论文30余篇，论著七八本。钩沉稽古，常有新意。后投身于文史考证与古史探索，尤醉心于古文物埋藏与考察，并做出重大贡献。

先生奋心于学术耕耘之际，正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勃兴之时。受时代新潮之激励，很有志于新考古学之钻研。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杭州，人们很少注意到文物古迹的出土和含义。当他听到古荡一带有石器出土时，他那好古、敏以求之的探索之心便意识到这一带埋藏着优秀古代文化遗存。1936年他随带良渚出土的黑陶到南京中央研究院访晤董作宾、梁思永先生，得到礼遇和好评，并使他深知这些发现对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便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由蔡元培先生题签书名，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行世。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这次发现和成果，诚如先生所言，就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而论，不啻为东南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和途径，深为学界所赞赏。

先生和后来发掘良渚遗址的施昕更先生一致认为：“吴越地区可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并驾齐驱。远古时代吴越地区也是孕育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流，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这种观点和看法，为后来考古发现所证实。

先生对自己研究文化和著书立说，有着明确的思想认识，也表述得很清楚：“我只觉良渚一带的远古文化遗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我所以要把全部所得经过整理考核做成著录，是盼望引起国人的注意。对固有的民族文化遗物，像这样可贵的实物资料的保存与发扬，是当予以应有的重视的。同时也为免于有的器物因偶然出土而散落或废失。”这些话充分表现出先生对保护研究祖国文物遗存的炽热情怀、远大目光和宏大抱负，即使今日也是顺时应世的卓识之论。

自此以后，他进入了真正考古工作者的角色，以唯物史观来探索中国古史，特别是文明史问题。1935年冬他在良渚发现的一个椭圆形陶盘中发现了十几个刻划的原始文字，他慧眼识珠，立刻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大史料意义，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从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与之相类的同形字相与类比。他认定这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他说：“这些文字刻于原器口缘的四周，并有锯齿形纹绘联络，故知其为文字而非绘画……但这种文字显然还在初创时期，大约是从象形纹绘所演进的。由这些象形文字的形体观察，不独比春秋时越国所传鸟篆等铜器铭刻为早，而为原始文字无疑。”当时卫聚贤先生也高度评价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发现和论述，并说：“何天行

先生在杭县良渚发现的黑陶文字虽不多……但为中国最古的文字是可以断言的。”他对这些文字一直在探微求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参考大量资料和甲骨文对比研究，对黑陶文字的解读做的考证有了升华。他认为：“陶文的研究，将是打开史前时期社会宝库的金钥匙。”近几年来，在全国一些史前遗存中发现了不少类似良渚陶盘的原始文字，证明何先生“金钥匙”的观点，对陶文在研究原始社会史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论断是深切而正确的。

先生孜孜不懈、执着追求、必得真谛而后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良渚文化发现后，他扩大考察范围，延伸到浙、闽东南各地。后来他虽家居修养，仍继续考察，坚持不渝。没有经费，自己节衣缩食，徒步考察，相继在1948—1949年、1950年、1951年、1952—1954年调查了会稽、余杭、余姚、上虞、绍兴、萧山等地，发现不少良渚文化和史前遗址，并与相邻省区福建、江西等地的史前及殷商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对比研究，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和论述。除有关良渚文化研究外，他还发表了《亚与夏》、《仲雍之国》和《楚辞作于汉代考》等论著。尤其是后者，曾得到蔡元培先生的赞誉，是先生终生难忘之殊勋。

先生乃君子人也，热情谦虚，和蔼可亲，并乐善助人。1949年秋，我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班，有幸拜识先生。当时先生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有暇我即去请教他关于良渚文化有关问题，多承垂教，并赠文献资料，十分感激。有一次我随夏鼐、董聿茂（博物馆馆长）两先生去良渚遗址考察，并请先生同行，先生给了我们很多指点和帮助。后来我到北京考古所，他曾多次来京，向文博界领导和同志反映情况，呼吁协助解决文物考古和良渚文化遗址保护和研究等问题。其拳拳敬业之赤心，令人感念难忘。

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是正身齐家的典范。我于1996年秋在杭州时，有幸得与家胜先生兄弟相识。家胜先生彬彬然有其父之风，孝悌之情溢于言表。虽未继父之志而业考古，但却能各执其业勤奋工作，可谓何氏有子矣。

现在，我想引述郭青岭《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何天行》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何天行先生一生，对古文化的研究与考古事业痴情不已，尤其对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倾注了毕生心血及对中国古文化考古与研究的执着热爱，他那坎坷而正直的一生，其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奉献与不懈的精神，让我们倍加钦佩，促使我们继承前辈事业为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事业、古文化与考古孜孜不倦、默默耕耘的精神，给我们以巨大的激励，他那对学术的执着追求的珍贵史料和随之提出的独到见解，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他是我们后学值得纪念、学习、继承和弘扬其德业光辉的一位先驱。”深愿后之来者深体斯意而有为焉。

（原载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

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何天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吴汝祚

1996年11月初在浙江省余杭市召开“纪念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得知此会邀请了何天行先生的一位子女参加，以表达对何先生在这一方面做出贡献的怀念之情，这是很有必要的。事后我接触到的学者，都与我有同感。因此对何先生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方面的业绩，在这里作必要的介绍。

何天行先生（1913—1986）字摩什，浙江杭州人。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毕业后，就入大学本科肄业，其后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干部、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等职。后因身体健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学术界，在家休养。

1935年何先生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得知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常有玉、石、陶器发现，而这些古器物很少被人重视，流落于民间。何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察知这些古器物决不是一般性的器物，而是浙江远古时代先民们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是研究浙江远古史的重要资料。所以，何先生就利用暑假时间前往良渚长命桥、荀山一带进行实地考古调查。及至毕业后，他工作之余，仍继续不断地进行考古调查。他对调查中获得石器、陶器，作了细致的观察、记录。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并得到了考古界前辈董作宾、卫聚贤等先生的鼓励、支持。这就更增加了何先生研究良渚文化的信心。他著有《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这本书由我国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题写书名，还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于1937年出版发行。这不仅是最早介绍良渚遗址的一本考古著作，而且在当时深受学术界重视，并被誉为具有创见性的作品。

何先生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除《卷头语》由吴越史地研究会撰写外，全书分为：一、绪言，二、遗址的发现，三、地层的大概，四、遗物的种类（分为石器与陶器两部分阐述），五、结语。最后，还附有卫聚贤先生的《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一文。在《绪言》中，何先生根据研究的心得，明确地说：“浙江在春秋战国以前，绝少历史上真确的史料，文化不彰，向以文身断发的蛮荒境界。现在发现了这样优秀的文化遗迹，可见浙江的远古文化本极悠久……不独藉此补充文献上所欠缺的材料，且从中国文化与起源与发展而论，这次的发现，亦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径。”其后，他在《本书的缘起》一文中说：“我觉得良渚一带的远古文化遗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我所以要把全部所得经过整理考核作为著录，是盼望引起国人的注意，对固有的民族文化遗物，像这样可贵的实物资料的保存与发扬，当给予应有的重视。”何先生的预断，是在中国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刚起步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这与现今太湖地区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是相符合的。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在桐乡罗家角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保存了一批木材，其中有建筑上使用的木构件。这些木构件有转角榫、带梢钉的榫、企口构件、栏杆横梁等。从“加工”的水平看，似乎要比河姆渡文化进步。马家浜文化之后为崧泽文化，它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现，为其后的良渚文化在良渚遗址营建约30万平方米的土筑高台的礼制建筑和土筑高台墓地奠定了基础。

土筑高台墓地内埋葬的大型墓葬，其随葬器物，从以往以陶器为主转变为以玉器为主，并且有了成组玉器的随葬，反映出已产生一定的礼制。从这些现象分析，良渚文化时期已进入到了文明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良渚遗址确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之地，“在远古文化的发展上确实卓有成果”。有的学者把这种土筑高台墓地称为土筑金字塔，以此形象地说明它的性质与金

字塔相类似。中国的黄河、长江与世界文明古国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相类同，因此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说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而何先生在这本书中则提出良渚发现的石器与陶器的制作水平可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还认为古代吴越一带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何先生这些很有见地的精辟之言，为我们研究良渚文化奠定了基础。

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人们见到后来卫聚贤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年来中国》一书内，写的《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章中，谈到何先生在良渚发现了黑陶。何先生就说：“而我所知，实应归功于在采访中告诉我出土陶器的乡民农人。”这是多么诚朴的学风。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何先生为人的正直品德。

何先生在大学时专攻中国文学，考古知识相当初浅。在当时的条件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从已有考古报告中引取借鉴。”又说：“凡遗址中有足以供研究参考的，即使是一块兽骨，或是一块陶片，都要把它记录下来。”由此可见，何先生的这种热爱考古事业、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使他在考古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必然的，值得我们钦佩。

当时做田野考古工作非常艰苦，而经费又不足。来往工地所必需的交通费、文物征集费等等，都是用何先生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去支付的。真是可谓痴情于自己喜爱的考古事业。

何先生不仅攻考古学，还著有《楚辞作于汉代考》。这部著作蔡元培先生看到后，对何先生加以勉励，使其终生难忘。因此，何先生是一位懂考古、精文学、擅诗词，毕生倾注于中国古文化的研究者，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

在何天行先生谢世的前两年（1984年），他在瓷盘上写了《筹笔》诗：“筹笔为成忆别诗，羲皇初考证前时。殷彝夏珞冠南国，著史寰畴序有思。”其诗注又云：“自予最早发现良渚文化至今已五十年，因书瓷记之。”这是何先生对考古事业部分追述的最后遗言，十分珍贵。

（原载《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

何天行学术年谱

1913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十一日），生于杭州福缘巷世医之家。幼名无双。

1917年，5岁。上私塾识字。

1920年，8岁。进杭州塔儿巷正则小学读书。

1926年，14岁。进杭州梅东高桥盐务中学读书，学名扶桑。铭文：“君子受乾阳健行之气，不可以息。”

1929年，17岁。以同等学历投考上海大同大学预科。用名：何天行，字：摩什。

1931年，19岁。1月，投考上海吴淞镇中国公学，入经济系，一年级改读文学系。

1932年，20岁。在中国公学读书，尝读新月书店出版胡适所著《淮南王书》，又从顾君谊授课中得到启迪，写了一些东汉末年人奉诏所撰的史书中亦有淮南王作《离骚赋》的记载等读书所得，请顾君谊和蔡元培看，得到蔡、顾二人勗勉。

1933年，21岁。暑假由上海泰东书局买来《清代朴学大师评传》、《楚辞研究》、《尚书去伪》、《朱谦之古学扈言》、《古微书》等，读后引伸斟解，颇有所得。致信中国公学校董会董事长蔡元培，言其《楚辞》传说考证。蔡元培评语：“中公学生何天行，好学深思。”

1935年，23岁。中国公学停办，经教育部大学甄别考试，以中国文学系第一名录取，转学至复旦大学四年级。文学系设考古学，学有所得。又由所学与民间探访启示，于暑假和寒假（1935年夏、冬到1936年初）发现杭州古荡、良渚出土石器、黑陶遗址（包括1935年冬发掘之著名的刻文黑陶盘）之后，敏锐地意识到发现了优秀的文化遗址，遂又至良渚、瓶窑一带进行广泛调查。通过系统考查（包括“偶作发掘”），知良渚遗址分布在“良渚荀山与长明桥、钟家村、卞家沙头一带”。

1936年，24岁。复旦大学毕业，经父亲何公旦介绍至浙江省财政厅工作。5月15日，著《仲雍之国：释吴》一文，后收入吴越史地研究会《吴越文化论丛》（江苏研究社，1937年7月出版）。8月30日，参加成立于上海的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的吴越史地研究会，将所采集和发掘的良渚遗址文物存放于上海金神父花园坊内吴越史地研究会址，并编成著录，供学术研究与展览。期间，去浙江绍兴、舟山、项里、荻埠、梅里、容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乘船至容山时，见出土晋瓷亦多。

1937年，25岁。1月1日，将收藏的石器、黑陶和晋唐古瓦等借于西湖博物馆举办《浙江古代出土物品展》陈列所用。3月30日，著《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4月，由蔡元培题写书名、卫聚贤附文《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出版。吴越史地研究会卷头按语：“本会会员何天行先生，近在杭县良渚发现石器与黑陶，其可贡献学术者有二：一为打制石器，如图1A、C、D及原岩石器（图1B），此即袁康所谓神农、赫胥时的石兵。其时代当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一为黑陶文字，见首图，沿边两处共有十个字。其字在甲骨文以前，为中国最古文字。现在何先生将他发现的石器及黑陶发表报告，作为本会丛书第一种。这次黑陶文字发见，是极可惊喜的。以后希望各会员大家起来，从事调查与研究，使本会更能够多有一种丛书出来，对于吴越古文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4月16日，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修改成题为《杭县第二区的史前遗存与黑陶文化》。5月19日，在《时事新报》吴越史地研究会主编的第9期古代文化栏目发表上文。该年6月至1942年2月，得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聘约，任国文教师兼代大学部讲师。

1938年,26岁。在《说文月刊》第1卷第2期发表《中国远古文化遗址的分布》一文。6月15日,在吴越史地研究会主办的《楚辞研究》发表《楚辞新考》一文。吴越史地研究会宣言云:“本会何天行先生有一关于《楚辞新考》,同时本会卫聚贤先生亦有关于考证《楚辞》的文章,并附录了丁迪豪先生的一篇遗稿,合起来成为《楚辞研究》,作为本会特种丛书之一。就‘楚辞’的‘楚’字表面上看起来,与吴越似乎无关。但有(1)楚国统治阶级原系北方的夏民族,而被统治的人民是苗民,苗民与吴越为同族。(2)吴国亡于越,而越又亡于楚,是吴、越与楚系在同一地域。(3)淮南大山小山之徒,严助、朱买臣之辈,均为吴越人,而其作品列在楚辞中。是楚辞不仅包括春秋时的楚国疆域——湖北、湖南的作品而已。据以上理由,楚辞列为本会丛书是适宜的。不过因其冠一‘楚’字,故列为特种丛书。本书的结论以《天问》时间最早,为秦汉间作品;《离骚》为淮南王刘安作,《九歌》系汉代的宫廷章乐。这种新辟的论调,在过去抱残守缺的人看来必定觉得惊异!但经这次周详的考证,应当清醒。自战事爆发后,本会暂无实地工作可做,遂将此书付印,一方使读者在顿阻的学术空气中解慰,聊有新的认识;一方藉此通告各会员,知本会在非常时期中,虽因环境关系不能畅所欲言,尚乃继续工作!”

1939年,27岁。2月,在《国际日报》发表《关于语文教育》一文。将《楚辞新考》、《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赠鸿英图书馆。

1940年,28岁。2月,在《学术》第1辑发表《甲骨文已见于古代说》、《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二文。《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根据《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的线索,推测殷民族与周民族早有往来,同样迷信占卜的周人早已学会龟甲兽骨占卜的方法以及契刻文字,并有将其保留存世的习惯。又根据《水经注》记载高陆县(属西安府)发现背部有八卦古字的龟,结合《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的句子,推测西安府有甲骨文,而且这种甲骨文多半是属于周民族的(这一推测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得到印证。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发现大批周人卜甲)。4月,在《学术》第3期发表《山东大辛庄商代遗址的发现》(译文)和《从古代中国的语文说到古史上几种现象》二文。4月6日,在《中美周刊》第1卷第28期发表《当前中等学校国文教学之弱点》一文。5月,在《学术》第4期发表《历城县王舍人庄商代遗址的发现》(译文)和《释越》二文。10月19日,在《中美周刊》第2卷第5期至第8期连续发表《推行基本汉字初论》一文。10月,在《中央大学学报》发表《商代的浙江》一文。12月,在《中美日报》发表《善战的中华民族》一文,在《正言报》发表《晋武帝在贫困中的建国》一文,在《报章史地周刊》发表《晋代初年的贫困建国》一文。

1941年,29岁。3月8日,在《中美周刊》第2卷第24期发表《论民族起源与文化孕育》一文。3月29日,在《中美周刊》第2卷第27期发表《东北与西南》一文。3月,在《学林》第5辑发表《夏代诸帝考》、《禹即九州考》、《桀放南巢考》三文。在《正言报》、《史地》发表《中国人口与土地不均》、《中国果真地大物博乎?》等文。6月,在《世界文化》第3卷第3辑发表《远古文化的一环》(译文)(原题《杭州良渚镇的黑陶遗址》)一文。

1942年,30岁。与顾锦元结婚。在《中央大学学报》发表《释白》一文。

1944年,32岁。为避战乱,至云和联立中学任文史地教员。发表《湖畔散记》一文。11月23日,在《青年日报》发表《夏代方位之蠡测》一文。

1945年,33岁。西湖博物馆从龙泉还迁杭州,任历史文化部主任。在浙江省教育厅全省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考试时任国文科考试委员。1月25日,在《青年日报》发表《记云和所出南朝古砖》一文。3月10日,在《青年日报》发表《山城杂忆》一文。4月19日,在《青年日报》发表《天台的历史文化》一文。5月3日,在《青年日报》发表《泛论地理教学与地理教材》一文。5月10日,在《青年日报》发表《王静安先生的生平》一文。5月24日,在《青年日报》发表《徐偃王载记》一

文。8月23日，在《青年日报》发表《中国之形成》一文。

1946年，34岁。将西湖博物馆浙江忠烈祠正门祠屋辟为历史文化部陈列室。1月16日，在《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2期发表《夏地理考》一文。4月，在《中华少年》第3卷第4期发表《一个平民阶级的大学者——墨子》、《台畔卧薪台上舞》二文，在《新中华》复刊第5卷第23期发表《安禄山为亚历山大译姓说》等文。

1947年，35岁。5月30日，著《楚辞作于汉代考》一文。

1948年，36岁。到会稽山以北调查，在漓渚山麓溪流边发现新石器时代橙黄色有凸横纹薄陶片与方格纹陶片。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从重庆到杭州复校后，担任图书馆主任（兼职）。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唐太宗》一书。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孔夫子》一书。

1949年，37岁。任浙江大学人类学古器物学兼职教授、西湖博物馆专门委员，加入中国人类学会、中国史学会。11月15日，在《文汇报》发表《记江南所发现殷商青铜器耕犁》一文。

1950年，38岁。任浙江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期间，时常到浙江各地调查踏看。在慈溪县小东门外的水田中从地面到深约1米的水田里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片及石器。在上虞县曹娥江口百官镇的龙山（茅蓬山）发现不少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其中竹筐纹陶片与古荡、良渚所发现的一样。在绍兴昌安门到五云门一带沿公路旁的田野上发现不少古陶片。

1951年，39岁。冬，在浙江省杭县塘栖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2年，40岁。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

1955年，43岁。协助李平心整理部分近代史资料。1月，在浙江省萧山县城西沿湘湖山麓路旁发现不少新石器时代陶片，为钱塘江以南首次发现的黑陶文化遗址（1990年、2001年两度考古发掘证实为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文化跨湖桥文化遗址）。在1955年第4期《考古通讯》发表《萧山湖岸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片》一文。在1955年第5期《考古通讯》发表《浙江上虞发现晋代瓷器遗址》。

1956年，44岁。由汪馥泉介绍去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

1957—1975年，45—63岁。著《中国服装史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文化史参考资料》、《中国边疆沿革地理资料》、《黑陶文化资料》、《记述浙江古代文化的初稿》（古国）、《记天目山地区所发现石器、陶器、陶片及天目书院资料》、《南宋故宫考》（南宋宫殿及凤凰山一带遗址）、《南宋官窑记述》、《余姚、慈溪、绍兴访古摘记》、《有扈考》、《斟灌斟邳考》、《夏殷之际种族文化考》、《说夏篇》、《夏代史研究》等文。“文化大革命”时期抄家时全毁。

1976—1980年，64—68岁。著《楚辞的产生》、《〈战国策〉无屈原事迹与考古发现资料试探》、《〈离骚〉中的句语名词试解》、《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考证它的作期和时代》、《汉淮南王与〈离骚〉的流传》、《屈原传说记疑与〈史记·屈原列传〉的考证》等文。

1981年，69岁。11月21日，著《亚与夏》一文。

1982年，70岁。在1982年第2期《江西历史文物》发表《亚与夏》一文。著《良渚镇的石器与黑陶》（良渚文化的早期著录）、《良渚文化黑陶文字试释》等文。

1983年，71岁。去良渚镇杜甫桥杜甫村调查踏看。8月20日，在《杭州日报》发表《良渚有杜甫桥和杜甫村》一文。

1984年，72岁。1月，为纪念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在瓷盘上题作《筹笔》诗：“筹笔为成忆别诗，羲皇初考证前时。殷彝夏珞冠南国，著史寰畴序有思。”诗注云：“一九三九年予从业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美籍地质学副教授Sterlings Beath晤见。盛意敦挚，为予一九三五年所始见良渚文化古器物著文，称述于纽约ASIA刊物上。此一古文化实物遂传知于国外。自予最早发现良渚文化至今五十年，因书瓷记之。”秋，又作《有怀》诗：“漱流每欲饮朝霞，珠珞长簏出海槎。拙守久

迂垂旧业，学邦今幸托文华。摭遗蠹测余三史，阙简容完补百家。晨发挂帆舒望慰，摛翰鹏展信无涯。”诗注云：“知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尝于著述中提及余有关《楚辞》旧作，因念从历史文献言自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一绪说，为此书感。”

1985年，73岁。著《回忆蔡元培先生》一文。

1986年，74岁。1月21日，病故。